

# 中国共产党 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问题再探讨

莫子刚

(贵州民族学院 民族文化系, 贵阳 550025)

**摘要:**中国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即所谓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其初衷具有较大的对中共的指向性。对于这一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首先是积极拥护和支持的,其次也是与国民党同中有异的,这种“异”主要体现在对“抗战到底”的诠释、如何集中意志与力量以达成国民精神总动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关系以及中共尤其强调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反对腐朽现象的重要性等方面。国共两党所代表的立场及其对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观点、措施不同也导致了各自所取得的成就不同。无论是从整个全国范围来看,还是从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区域内来看,中共对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都是有功劳和成就的。

**关键词:**抗战相持阶段;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态度同异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3-0104-08

就我所见,目前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极少,仅有周韬、谭献民的《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一文<sup>[1]</sup>,对中国共产党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所持的态度、所作的部署、所采取的一些相关行动及其成效进行了阐述,但该文没有阐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发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没有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这一运动中所持意见的分歧以及中共正确意见对这一运动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此外该文基本上只是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的少数几个文件内容的简单罗列,而没有进行更为广泛的资料搜集,也没有进行由表及里的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其实,经过深入探析,我们发现,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抗战中后期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分歧,反映了两党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心路历程,因此很有必要撰文论述之。

## 一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之发动及其对中共的指向性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后,中国抗战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所谓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由于日寇更侧重政治进攻,重视采取精神上的制服手段,企图“分解我们的精神,然后来征服我们整个民族”<sup>①[2]497</sup>。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深感中国的抗战,“绝不能专赖兵力,必须动员民众的精神,组织民众已发动的精神,以全国的精神意志力量的总和,来做前方将士的后盾”<sup>②[2]495</sup>。1939年3月12日即孙中山逝世40周年纪念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颁发《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实施办法》,开始在全国厉行精神动员<sup>[3]</sup>。该纲领指出,在第二期抗战中,“精神尤重于军事”,必须提高全国军民“坚强不屈之精神”,才能“克服艰危而打破敌人精神制服之毒计”,号召“动员全国国民之精神以充实抗战之国力”;该纲领标举

收稿日期:2009-12-25

作者简介:莫子刚(1963—),男,苗族,历史学博士,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系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和西南近现代区域史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

了三个共同目标,即“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要求树立共同的救国道德即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确立建国之共同信仰即三民主义,并要求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苟且偷生之习惯必须革除,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分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从而达到国民精神之“充实”、“集中”乃至“革命化”,完成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目的;同时,该纲领及其实施办法还规定,“应由党政军民全体一致共同努力”,各省、县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为领导机构,通过举办国民月会等形式,开展“倡导与宣传教化”等工作,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sup>[4]445-446</sup>。此后,这一运动“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推展开来”<sup>[3]</sup>。

国民政府在抗战第二阶段大力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除了战争的长期艰苦性以及日寇对华政策的改变而确实需要调动精神力量以弥补物质不足、对抗强敌、赢取胜利的对策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防共、限共、反共的政治需要。中共中央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由于日本大肆侵华而国民政府节节败退,以致全国要求抗日与反蒋独裁的西安事变发生,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迅速形成。在这一有利形势下,到1939年前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革命队伍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比如1937年8月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仅有3万余人,到1938年底已发展到20万人左右<sup>[5]292</sup>。江南各地中共领导的新四军等武装也处于迅速发展之中,至1939年前后已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此外,中共党员人数也已由区区几万人发展到数十万人。中共势力迅速发展壮大的这一局面,令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日益不安和恐惧。然而,国共合作以推动抗日救国的大局,又不容许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对中共及其武装力量进行公开的明目张胆的武力围剿。事实也一再证明,那种不明智的武力进剿做法,只能使国民党失却民心,丧失统治。因此,处于第二期抗战初期的国民政府只能一面偷偷摸摸地支持“摩擦”,一面又借助于国民精神总动员这种较为隐蔽而堂皇的手段和形式来防范、限制、反对共产党,束缚共产党的发展,企图使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存在与发展。正如论者江涛所言,“在军事限制的同时,鉴于统一战线的存在,蒋介石更注意从政治思想方面限制其发展,使

之逐渐失去在群众中的影响”<sup>[6]198</sup>。

对此,中共洞若观火。1939年1月,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防共限共政策发出了《中共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政策的指示》,指出,“国民党目前的进步也包含着防共限共工作的强化,这是进步中的恶劣现象,一时尚不会降低”<sup>[7]12</sup>。当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时,中共中央又委婉地表明,国民精神动员纲领中有“某些含意不明的词句”,必然会成为有人“推行‘防共’和反八路军新四军与陕甘宁边区的工具”<sup>[8]</sup>。1939年3月22日,刚参加过国民政府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的林伯渠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不少内容是对付共产党的,企图在理论上与我党斗争。毛泽东的《论新阶段》<sup>⑤</sup>在上海印了十二万份,共产党的各种书籍在外面销售很快,国民党表示害怕”<sup>[9]117</sup>。另外,我们从《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一些规定中也着实可以窥见国民政府借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达到扼制中共势力的难以告人的真实企图。比如它要求一切思想言论悉以如下几点为准绳:“(一)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二)不鼓吹逾越民族之理想和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三)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四)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否则,就是“分歧错杂”的思想,应予以严厉制裁<sup>[4]452-453</sup>。

那么,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推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又采取了怎样的应对之策呢?这应当说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积极响应与拥护,另一方面又与国民党的主张同中有异。

## 二 中共对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积极响应和拥护

1939年4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指示》及4月25日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胞书》中明确指出:“基本上拥护此纲领”,并愿意“运用与发挥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来提倡为国家民族、为精诚团结、为三民主义的全部实现,为争取抗战建国最后胜利而牺牲奋斗、竭忠尽孝的革命精神,来养成奋发有为、朝气蓬勃、大公无私、见义勇为、舍生取义、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信心的新国民气象”,认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所提出的目标“是根本正确的”;要求广大共产党员,除了自己真诚拥护、做不怕牺牲个人一切、拥护国共合作、践行三民主义之典范以外,还应该竭尽“智能与精力”,努力

号召全国同胞积极拥护这一运动,“严厉批评”、“无情指摘”那些在前线后方“违反和破坏军事胜利的有害活动”及“不顾民族利益的自私自利之徒的罪行”,“与各界先进人士,一致努力”,“赞助政府”,把它“推行于全国”<sup>[10]</sup>。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抱这种拥护、支持的态度,主要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人也和国民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一样,深谙开展这一运动的必要性。当时的中共党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指出:“在抗战正困难艰苦的现在,动员全国国民精神,以充实抗战力量是非常必要的”,我国国民精神的“动员程度还不够深入;动员的范围还不够普遍;全国国民的同仇敌忾、誓歼寇仇的情绪,还不够高涨”;少数国民“尚没有深刻意识到自己是整个中华民族争取生存权利的战斗生活的一个细胞,缺乏普遍的紧张意志、为抗战而牺牲一切的决心。因此,精神总动员,在目前实属刻不容缓的急务”<sup>[10]</sup>。毛泽东也多次指出:“因为日本同汉奸这样猖獗,所以我们要在全国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四万万五千万人大家团结起来,振奋抗战到底的精神”<sup>[11]480</sup>,“中国需要全国总动员,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sup>[9]120</sup>。

事实上,早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发动之前,中共中央就已号召全国各族同胞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精神、物质等各方面的总动员。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 and 中华民族的潜力指出:“中国虽是一个弱国,然而如能使全民族摆脱一切精神上的桎梏,振衰起蔽,团结一致,抵抗外寇,即将起死回生,无敌于天下。”<sup>[12]</sup>1937年8月,中共中央于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宣传鼓动提纲,号召今后的任务是要以最大的努力,去“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sup>[9]15</sup>。1938年9月,在中共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宣传鼓动工作,除了利用英雄典型以激发爱国和揭发、清洗、淘汰妥协悲观腐败等民族消极性以外,还必须控诉日寇的暴行,使世界晓喻,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自信心,完成精神上动员的目的。1939年2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sup>[9]108</sup>。

既然中共早就有动员全国力量以进行抗战的想

法、主张,或者说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开展本身就是中共和全国人民不断敦促推动的结果,那么,当国难临头、国民政府正式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时,中共无疑会表示热诚的支持和拥护。更何况,它还可以借此运动来“进一步推行自己一系列的抗日主张和纲领”<sup>[11]</sup>。

出于热诚的拥护和支持,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对如何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进行了积极部署与安排。除了在前述有关指示中努力号召鼓动、严格要求党员去积极行动、勇于实践以外,中共中央还于193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了盛大的有各党政军民机关团体参加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誓师大会。会上,毛泽东等领导人作了热情洋溢的讲演,并带领全体与会人员一起宣誓,朗诵国民公约和誓词。会议通过了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全国各界的通电,表示将竭诚拥护精神总动员的纲领,誓死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去实行一切力量的总动员。会议还拟定了“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血战到底”,“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等22条专门口号。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在行动方面,中共要求各根据地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宣传周,召集各种群众动员大会,发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竞赛运动,建立反腐机制,厘清财经制度,惩罚贪污腐败分子,树立艰苦奋斗、平等民主、积极向上的新观念新风尚等等。中共的一些地方党委也非常重视这一运动的贯彻落实,如浙江省党委1939年7月曾规定把“加紧国民精神总动员”作为今后三大基本工作任务之一<sup>[13]729</sup>。

### 三 中共对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认识又与国民党同中有异

由于国民党所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纲领中有反共、防共的一面,很不利于全民族抗战和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因而中共对它的拥护、支持自然也是有所保留的。1939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其第二次有关指示中指出,要在运动中“显示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实质”,以自己的立场给精神总动员的纲领条文以正确的解释和有益改造<sup>[14]63</sup>。接着,中共中央在“五四”指示中又指出,在基本拥护纲领的同时,还要反对与打击一切消极的东西,“一面反对防共分子的观点,一面反对反民族分子的观点”<sup>[14]45</sup>。这就决定了国共两党在有关

这一运动的许多重要观点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即所谓同中有异。而这些“异”又尽显出中共积极推动这一运动的真诚与努力。

### （一）关于“抗战到底”

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开展的过程中，国共两党都高呼“抗战到底”的口号，但两党对这一口号中的“底”字的诠释却很不相同。中共主张，抗战到底就是要打到鸭绿江边去，彻底收复一切国土，彻底把日寇赶出国土去，这表明中共的“血战”决心和真诚奉行国家、民族至上的理念。而国民党心中的“抗战到底”的目标却只是要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国土状态，仍然置广大的东北地区于不顾，并明令要求“违抗命令的共产党员遵守秩序”<sup>[5]304</sup>，这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国民党的“抗战到底”是打了折扣、留有很大余地的，其“国家民族至上”的口号也具有很大的虚伪性。可以想见，一旦其统治范围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其统治地位遭日寇严重威胁的岌岌可危之险情被解除之后，国民政府的抗战就很可能停滞不前了，就不再需要什么国民精神总动员了。

与国民党另一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战到底”与“争取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坚决抵抗日寇到底，就决不会有民族的解放；不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为民族的幸福，就决不是民族的最后解放”，“抗战到底和争取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就是‘民族至上’”<sup>[12]</sup>。而国民党却很少提及这一点。

这种相对不同的“抗战到底”的目标要求和对大多数同胞幸福的不同程度的强调，不仅可以表明国共两党之中谁会更长久地维护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谁将会使之半途而废，而且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两党对抗战进程中出现的摩擦分裂、妥协投降等现象的迥然不同的处置态度。为了限制异己、防共反共，国民政府一面高喊要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一面又在很多时候默许、纵容甚至不惜亲自导演这些摩擦分裂、妥协投降现象，完全不顾这些现象对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严重阻碍作用。而共产党则相反，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使命、责任和抗战的极其艰苦性，因而不但不遗余力地打击这些现象，而且对国民党的不良行径予以坚决的纠正和毫不留情的揭露。尽管国民党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抗战到底”，但中共领袖们还是号准了他们的脉搏，敏锐地洞悉他们心目中那些难以

告人的真实想法。周恩来、毛泽东等人认为：国民党“投机不成，投降又不敢”，“但投机性、反动性还继续保留着”<sup>[15]191</sup>，他们现阶段虽然是一只手打日本，一只手防着共产党，但“将来有可能两只手搞到一起，统统来打共产党”<sup>[16]192</sup>。王明也指出：“如果蒋介石真的想把抗战进行到底，那么他不仅在反对公开的叛徒上，而且在反对反共投降分子及反对反革命分子上都应采取有力步骤”<sup>[5]302</sup>。

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发动之日起，就反复强调要坚决遏制、消除防共反共、消极妥协等阴谋现象，从而保证该运动的有力开展。例如，193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指出，要真正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使“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而彻底打败驱逐日寇，就必须“坚决打击那些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卖国贼”，“深刻批评”那些“不明大义”、“受人蒙蔽”，陷在日寇汉奸汪派托派的阴谋陷阱之中，企图以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来代替、掩盖甚至等同全国家或全民族最高利益的人<sup>[12]</sup>。在其第二次指示中，中共中央提出了更为系统的办法，要求各类地区在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之时，应依据不同情形采取不同方法去剔除它们：在党的力量占优势的地方，应充分运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公开批评各种不良现象及防共阴谋”；在非蒋嫡系统治地区，要借助该运动，团结地方进步势力和同盟者，“打击蒋介石企图以此破坏团结的阴谋”；在后方国统区，则要求以“普通群众”的身份，运用合法手段和机会，去“进行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宣传与组织工作”，联系反贪反腐斗争，“减弱与打消国民党，以此来进行防共活动的阴谋”<sup>[14]46</sup>。毛泽东还作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演讲，专门讲了全国同胞应该团结起来，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积极抗日，反对妨碍抗战，纠正各种错误倾向，保障运动具有正确政治方向等问题。

### （二）关于如何集中意志与力量以达成国民精神总动员

中共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凝聚民力、动员民众、完成抗战大业的最好政治基础和组织依托形式。在抗战的新阶段中，这一统一战线必须以“广泛发展与高度巩固”的新姿态出现，“一切意志和力量都要集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处，决不能违反”<sup>[11]482</sup>，决不能集中在第二个地方<sup>[12]</sup>。

那么,怎样才能搞好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下简称统一战线),最后夺取抗战之胜利呢?中共中央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注意。

一是广大党员干部自身要增强与日寇血战到底、做抗战中流砥柱的决心和信心。“即使大半天黑了,剩下共产党抗日”,“也要干下去”<sup>[17]231</sup>。惟有这样率先垂范,才能不令而行。

二是要进行广泛而有力的宣传。在宣传中,尤其要注意根据国民精神总动员中的“一切积极的东西”,去“解释和发挥自己坚持抗战的正确路线”,去防止、打击日寇汉奸汪派托派等利用它的“某些含意不明确的词句”进行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要广为传播民族革命典型,“多方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揭露控诉日寇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事例”,“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要“号召全国同胞严厉批评一切贪生怕死之徒,无情地指摘在前线后方一切违反和破坏军事胜利的有害活动,无情地指摘一切不顾民族利益的自私自利之徒的罪行,号召全国同胞对于这些败类给予应有的制裁”<sup>[12]</sup>。

三是要力倡民主。因为中共认为,民主政治方式是能够集中最大力量源泉的方法。国民政府虽然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但它却根本不敢真正开放民主,动员民众抗战,相反却顽固坚持独裁统治,钳制民主自由,限制人民抗日。在国民政府看来,“民主与军事是水火不能相容的”,民主必然会妨害民众动员,即使要讲民主,也必须使之与集权“相辅而行”<sup>[2]495</sup>。国民政府无理指责那些担心现政府及其首脑会“漠视人民权利”者实际上是“不能互信共信之人,是有私心杂念之人”;借口要统一全国意志和力量,指责中共和其它民主党派不尊重所谓国家法令权力的绝对性<sup>[2]478-479</sup>。针对国民政府这种立场和思想误区,中共中央指出,“国民精神应当成为全国人民广大的政治运动,精神动员即是政治动员,它不依靠于强迫命令,而依靠于人民之政治的自觉。若以强迫命令的方法行之,必致成虎头蛇尾,官样文章而毫无生气。只有经过民主方式,着重宣传鼓动,才能推动全国人民,造成压倒敌人刷新自己的巨潮”<sup>[12]</sup>。要想使“国民精神之彻底改造,纠正醉生梦死之生活,革除苟且偷生贪污腐化之恶习,打破自私自利之企图,纠正汉奸托派顽固分子腐败分子纷

歧错杂之思想和荒谬的行动,必须依靠于广泛的民主,发扬民主精神,才能启发人民爱民族爱国家之至高无上的观念,以献身于革命事业”<sup>[8]</sup>。“假使民主政治能迈步前进,则广大民众耳目一新,将争自奋发,引抗战为他们本身应尽的责任,为战胜日寇而增大无限力量的源泉,这对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sup>[2]468</sup>,那种否定民主的做法“显然会妨害抗战的进行”<sup>[2]488</sup>,不能设想,不民主的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不能设想,这种政府能争取最后胜利”<sup>[17]213</sup>。

至于统一,中共认为,“统一只能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不能统一于某一个党派”。中共不仅积极要求国民政府必须实行民主政治,给各党各派和广大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权利,它自身也是履行民主政治的典范。它创造性地在自己所领导的根据地内实行“三三制”、基层民主选举等措施,热情发动、真诚邀请各阶层各阶级民众参与抗战政治,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极其愿意实行民主,并以它来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和完成抗战使命。正因为国民政府不太在乎统一战线,故它在抗战中时常表现出动摇、妥协、反共、摩擦、分裂等“违反抗战国策、违反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基本精神”的不良倾向。也正因为中共充分认识到统一战线对于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完成抗战使命的重要性,故它对国民政府的不良做法深感担忧和痛惜,因而也被迫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斗争实践中采取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斗争只是手段团结才是目标的特殊应对策略。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之关系<sup>④</sup>

国民政府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强调,要坚持三民主义的中心信仰。对此,中共在表示完全赞同的同时,也突显了自己的主张。

首先,中共肯定了实行三民主义的必要性。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留给中国人民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应当继续发扬光大”<sup>[9]55</sup>,中国要想继续抗战,就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而要动员人力物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sup>[9]108</sup>。

其次,中共反对假三民主义,主张真三民主义。中央认为,那种“口称信仰民族主义而又企图与敌人妥协,口称信仰民权主义而又实行压制人民,口称信仰民生主义而不顾人民生活痛苦,都是假三民主义

者”，必须加以反对和戳穿；要实行真三民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一切有意无意曲解三民主义而成为汪精卫辈精神上俘虏的人”，坚决反对“一切企图利用托派奸徒把三民主义解释为反共旗帜的人”，坚决反对“一切对于三民主义阳奉阴违，口挂三民主义之名躬行贪污腐化之实的人”<sup>[12]</sup>。至于什么是真三民主义，毛泽东指出：“只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始终不投降，不叛国，才叫做真正信仰民族主义”；“只有给老百姓以民主权利，给老百姓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不压迫老百姓，而且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实行‘唤醒民众’，才叫真正信仰民权主义”；“只有努力于解除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痛苦，譬如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实行生产运动，使大家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才叫真正信仰民生主义”<sup>[11]484</sup>。而共产党也是真正履行了三民主义的要求的，“我们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英勇斗争，这就是实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我们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群众参加抗战，这就是实行民权主义，我们在战区协助当地政府改善了人民生活，这就是实行民生主义，总之八路军新四军已努力的实现了三民主义与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纲领”<sup>[18]</sup>。

再次，强调两者既是好友又有差别。马克思主义永远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那种否认这一思想的说法无疑就是“反对统一战线”，就是“反对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人民和全民族的”<sup>[11]483</sup>。“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互相帮助和亲密合作是推进中国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是走向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指针”<sup>[19]</sup>。但二者即使“在抗日过程中也是有区别的”<sup>[17]219</sup>。“假使不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分别清楚，不仅国民党人可以有两种看法，即一种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既没有分别，共产党大可不必再相信共产主义；另一种是三民主义既包括共产主义，则共产党在中国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便连非国民党人也要这样想，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既是没有分别，至少是现在没有分别，共产党人何不先将三民主义做好，而不必再说什么共产主义，至少是现在可以不谈。甚至共产党人也会这样想，共产主义是将来的事，现在做的完全是三民主义的事，或者想将三民主义解释成为共产党的东西来符合我们民族、民主的乃至社会主义的纲领。这都是不妥的，只能模糊社会视听，增加国民党的自大心理，并不能帮助统一战线的发展”<sup>[20]47</sup>。正因为既是好友又有差别，中共

表示，既愿真心诚意地“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又“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sup>[21]17-18</sup>。

(四)尤其强调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反对腐朽现象的重要性

中共十分赞同实行国民精神改造的必要性，但认为在精神改造的工作中，最首要的还在于如何树立艰苦奋斗的作风，祛除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腐败现象。它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纲领所要求的“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苟且贪生之习气必须革除”、“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的做法，与自己历来所倡导的艰苦奋斗作风是基本一致的。它认为，要搞好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打败日寇、完成抗战、永葆民族生机和活力，全国人民就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根本改变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sup>[11]483</sup>。它指出，“一切不愿意作汉奸的人，必须在这次国民精神总动员中认识养成艰苦奋斗作风之必要，否则是非常危险的”，就会像汪伪一伙那样，“失去朝气”、“陷入深渊”，成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sup>[12]</sup>。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根本利益的真正代表，其本身就是艰苦奋斗、勤俭生活的光辉典范，具有这种作风的政党是不能被搞掉的，如果不幸被“搞掉了，中国就不妙了”<sup>[22]193</sup>。中共认为，要想使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树立和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必须纠正诸如利用三民主义反共或暗行贪污腐化，与敌人妥协投降、作战不力，无组织纪律、阳奉阴违，乘机发国难财，为了一己之利而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等，与艰苦奋斗作风做法相背离的、不利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开展和抗战进行的纷杂错误思想和行径。

#### 四 余论

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目的，“是求精神物质之均衡的配备与扩展，使能符合于军事胜利之决定条件，决不是倚重精神而忽视物质，而是要善用精神的特长，来补充物质之不足”<sup>⑥[3]</sup>。客观地说，国民政府发起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其初期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它对于激发军队士气和民众热情，动员组织民众，提升团结御侮、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增强抗战力量等，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体说来“并没有达到预定目标”<sup>[1]</sup>。抗战期

间,在国民党内、军队内和统治区域内处处出现的政治黑暗腐败、大发国难财、醉生梦死、患得患失、妥协投降、争权夺利、节节败退、民气颓废等丑恶现象就是证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最根本的还在于国民党政权本质上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这种阶级属性,它顽固抱定不依靠人民群众甚至害怕、限制人民群众参加抗战的狭隘思想政治路线,这就决定了它所发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之初衷带有难以调和的矛盾性,即既有动员民众积极性以参加抗战的一面,又有暗中防范、限制、反对甚至迫害“异党”及人民自由的另一面。在运动中,国民政府一味地强调所谓国家利益和自己党派的利益,一味地强调自己的统治秩序和所谓政府的意志与威望,而对其它党派和民众个人的利益没有统筹兼顾、积极合理的梳理和处理。在采取具体政策措施方面,尤其未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民主权利,没有很好很认真地去探讨到底如何引导、培育、调动民众固有的积极性,以便更好地推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这种自相矛盾、南辕北辙的做法带来的结果无疑是可想而知的,以致这场运动虽然一时轰轰烈烈,但仍然避免不了逐渐消寂、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命运。

而中共当时对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影响和取得的成就则大不相同。从整个全国范围来看,国民政府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初期所取得的那些成就不可避免地有赖于中共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中共主张民主、反对妥协、坚持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倡导艰苦奋斗作风以及竭力防范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消极方面”<sup>[9]120</sup>等先进做法,对保障运动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轨道前进,使其尽可能持久的开展下去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中共自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区域内来看,更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自强不息,越是艰苦越向前。在日寇大举进犯、战事频繁残酷,而国民党反动派又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中共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通过精神总动员,使抗日根据地军民焕发

了精神,鼓足了斗志,壮大了力量,从而克服了困难,走出了事业低谷,坚持抗战到完全把日寇驱逐出国土,并由此形成了一套能够战胜任何困难与强敌的优良革命传统和精神,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它所领导的根据地区域内,形成了一派奋发向上、民主活跃、生机勃勃的欣欣向荣景象,成为当时全国青年志士热烈向往、争相奔赴的地方。纵观中共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大都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相辅相成。可以说,它们是中共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之精神贯彻落实于工作实践中的另一具体形式。中共实行公开选举、三三制参政、同级参议会监督等政治模式,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群策群力,以发扬民主、巩固扩大政权基础。它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租税模式,旨在团结包括开明士绅在内的各阶级阶层人士,保护和激发他们抗战建国的积极性。它广泛发起大生产运动,旨在战胜困难、渡过危机,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理想信念。它进行普遍的整风运动,旨在肃清纷杂错误思想,达成思想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它极其重视文化、教育、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旨在从各个方面营造有利于培养抗战精神和良好道德风尚的社会环境等等。总之,通过这些政策措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那种化解困难、动员国民、完成抗战建国使命的功能最终得以很好的体现。

当然,在国民政府制造的越来越咄咄逼人的限共反共的严峻形势面前,中共对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推展等方面也被迫采取了某些政治斗争的政策措施,但由于它的党派利益与人民、民族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且奉行了全民抗战的民主进步的思想政治路线,因而它所领导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也就能取得难以比拟和估量的巨大成就。这一运动虽为国民政府所发起,但正如一条小河一样,当它流向中共领域之后,就迅速汇入到其所领导的民众抗战洪流之中,成为其力量的一部分<sup>⑥</sup>。正因为中共能真心地代表人民、民族的利益,善于利用形势、审时度势,其事业也就能日益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

#### 注释:

①社论《增强精神抵抗力》,重庆《新蜀报》1939年2月20日。转引自:参考文献[2]。

②社评《军事第一,胜利第一》,重庆《时事新报》。转引自:参考文献[2]。

③毛泽东在此文中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观点,指出对付国民党的正确策略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合作和让步都应以相互承认对方为前提,不能因合作与统一而抹杀了党的独立性及其必要权

利。

- ④中共之所以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时期特别重视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联系与区别问题,也是从其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愿望出发的。换言之,即它认为,要想搞好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集中力量与意志,就必须处理好两种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既要了解两种主义之间的客观不同,又要承认和重视它们的相同内涵,从思想信仰根源上去寻求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合作基础;否则,一切都等于空谈。本来这也是中共所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看法之一,可以归之为前述第二点之中,但由于我个人认为中共对这一问题重视的程度较为突出,并且似乎还有不同于前述内容的其它歧义,故把它单独列为一加以阐述。
- ⑤《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1941年7月编印),第22-35页。转引自:参考文献[3],第57页。
- ⑥因而中共在推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方面的观点看法、政策措施及成就评价也就难以被单独剥离出来,加以准确论述。

### 参考文献:

- [1]周韬,谭献民.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6):57-61.
- [2]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G].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 [3]谷小水.抗战时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J].抗日战争研究,2004,(1):45-57.
- [4]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G]//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 [5](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 [6]江涛.抗战时期的蒋介石[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 [7]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 [8]社论.国民精神总动员[N].新中华报,1939-04-25(1).
- [9]逢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10]社论.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胞书[N].新中华报,1939-04-26(1).
- [11]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G]//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 [12]中共中央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N].新中华报,1939-04-28(1,5).
- [13]《中共中央东南局》编写组.中共中央东南局[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 [1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G].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周恩来自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7]反投降提纲[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8]延安各界精神总动员宣誓,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志盛[N].新中华报,1939-05-07(4).
- [19]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N].新中华报,1939-04-28(6).
- [20]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提纲)[G]//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1]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 [22]永久奋斗[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凌兴珍]